

回歸十年的香港經濟：結構轉型還是結構解體？

[曾澍基](#)

2007年6月

(一) 引言

香港回歸十年，經濟方面最常聽到、看到的名詞是「結構轉型」及「重新定位」。無他，特區面對了巨大的衝擊與外在環境的快速演化，前景變得頗不明朗；再度擁抱繁榮或者走向難以逆轉的下坡，都有可能。

筆者曾經分析過這種波動的內外成因(例如曾澍基，2003；Tsang, 2003a; 2003b)。目前，香港正陷於三重的困局：

一、中國大陸與香港特區的經濟整合，顯示出高度的不對稱性質。香港要維持作為具有本地優勢的群聚中心(cluster) (Krugman, 1991; Tsang, 2004)，難處甚多。

二、香港長期的、深層的局限---包括人口的質量及科研水平等制約浮現，對本地競爭力的提升形成巨大挑戰。

三、香港的發展非常之不平均。最龐大的企業集團已進升為世界級別，運作範圍超出狹小的特區，但一般以至中下階層的經濟利益單位却追趕不上。這帶出了「香港屬誰？」、「誰會為香港拼搏？」等牽涉不同界別的身份認同問題，並將引起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後果。

(二) 經濟融合的不對稱結構

1970年代末期，中國進行改革開放，香港經濟的處境大變，開始出現結構轉型，製造業大規模北移，轉口重新超越本地出口。1990年代，香港邁向所謂「曼哈頓化」(Tsang, 1994)、「非工業化」(見表一)。同時，過渡綜合症(transition syndrome)導致各方的短期行為，造成金融地產泡沫；在固定匯率底下，香港的競爭力受到削弱。

1997年回歸後，中央為了要彰顯「一國兩制」，提出對特區「河水不犯井水」的口號。不幸地，東亞金融危機刺破過渡之前冒湧的泡沫。矛盾暴露，通縮展現。2001-2003年財政赤字擴大，SARS疫潮又來突襲，引發出特區政府的管治危機。

表一：香港的產業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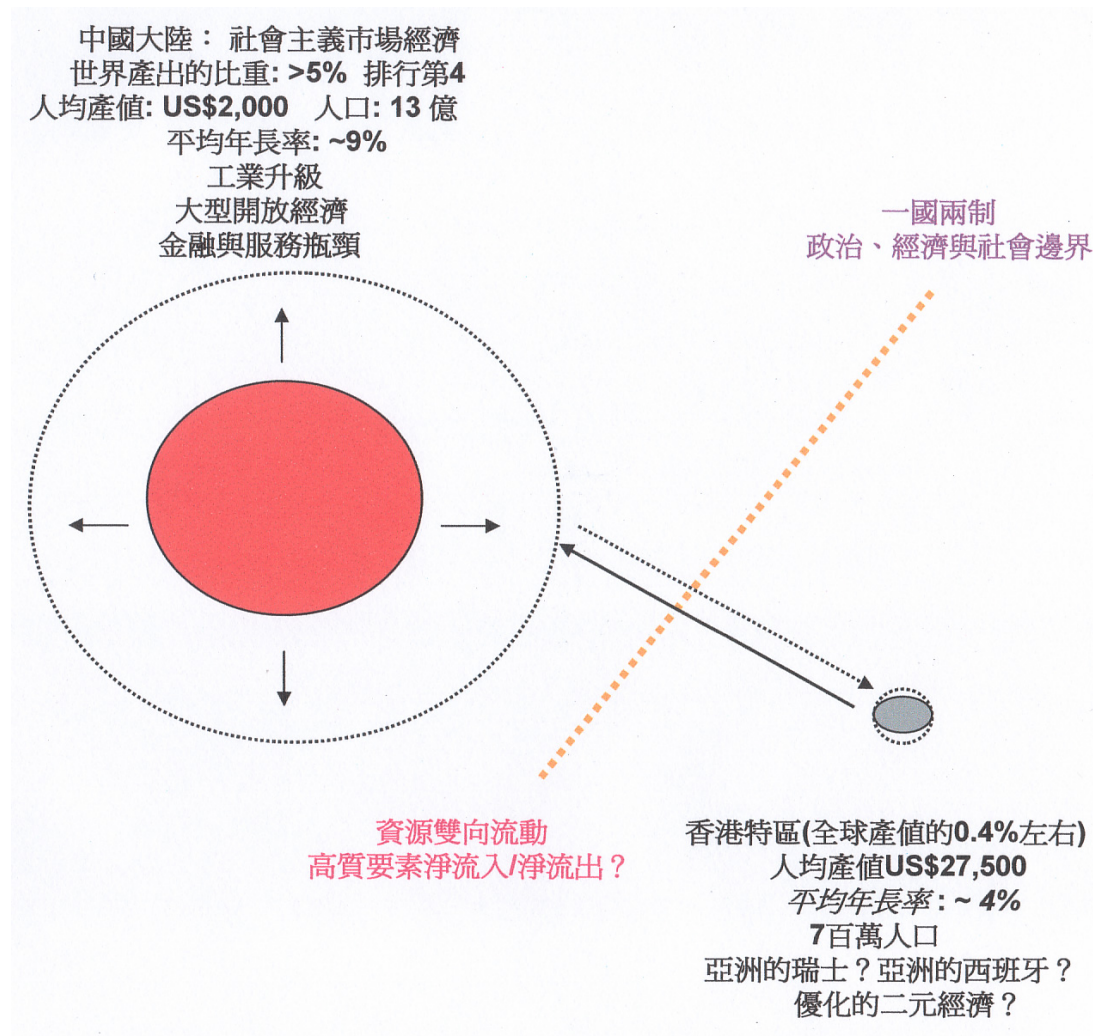
	1980	1990	2000	2005
漁農業	0.8	0.2	0.1	0.1
採礦及採石業	0.2	0.0	0.0	0.0
製造業	22.8	16.7	5.4	3.4
電力、燃氣及水務業	1.5	2.4	2.9	3.0
建造業	6.5	5.2	4.9	2.9
服務業	68.3	75.4	86.6	90.7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19.4	23.7	24.6	28.8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6.9	9.0	9.5	10.1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21.7	18.9	21.4	21.9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1.9	14.1	19.9	19.2
樓宇業權	8.4	9.7	11.3	10.7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2003年中，中央改變對港政策。內地的扶持措施---CEPA、個人遊、和「9加2」等相繼出台。特區經濟乃反彈，財政再現盈餘。不過，國內主要的城市經濟急速興起，地方政府一般非常進取；相對下，香港却受制於自由主義和保守政策的傳統。

中國大陸與香港的經濟融合，有一個結構性的特點：就是融合的雙方，在絕對體積、人均產出水平、增長速度、制度型態以至政策等都存在顯著的差異(如下圖)。這種不對稱，意味雙方於不少領域可以互補；但也帶來發展口徑不同、

取向分歧與相互競爭等難題。當「一國兩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邊界的剛性愈來愈低、跨境資源雙向流動愈來愈強時，關鍵就在高質要素向那一方淨流入？從那一方淨流出？

圖一 經濟融合的不對稱結構



(三) 中國大陸與香港發展的相對口徑

改革開放下，中國對外貿易快速膨脹，增長率大幅地高於國民生產總值/國民總收入(GNP/GNI)；故此，總進出口佔國民總收入的比率由 1978 年的 9.8% 躍升至 1990 年的 30%，近來更超越了 60%，比 21 世紀初世界平均的 42% 左右高出一半；也遠在美國、日本、印度等 20% 水平之上。其中當然有匯率及價格影響估算跟加工的重複計算等問題，但趨勢卻難以忽視。

中國的粗放式、外向型的發展策略看來要有所調整，對外經濟關係應當優

化。着眼點乃提高外貿的附加值和效率，移離低層次、耗費資源的「大進大出」。一方面須拉長國內的供應鏈，以擴闊對外貿易的幅射範圍，帶動更廣泛的區域活動；另一方面則提升出口產品的檔次、素質，創造較多品牌，避開國際市場低檔的惡性競爭，減少貿易摩擦的機會。

核心問題牽涉國家的整體發展道向：包括內需與外需如何取得平衡？怎樣增進效率，從粗放式增長轉化為集約式增長？

對香港特別重要的是廣東省的工業升級計劃。經過 20 年「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前店後廠」式起飛後，廣東正面對資源、土地及高質素勞動力的嚴重制約，出路只有轉型和突破。就此，香港以往跟廣東的經濟關係雖然密切，但製造業卻因為向成本相對地低的珠三角轉移，科技進展緩慢，本身成為了「前店」，變作服務經濟，未來對廣東所能提供的助力非常有限。

廣東省委關於制定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2005 年 10 月 29 日中國共產黨廣東省第九屆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以「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全面提升產業素質」為綱領，提出了未來的工業發展方向：

「優化工業產業結構。堅定不移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大力提高工業九大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競爭力，實現工業發展的高級化和適度重型化。做大做強電子資訊、石油化工等支柱產業。加快發展汽車、裝備製造等主導產業。積極培育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戰略產業。改造提升紡織服裝、食品飲料、建材等傳統產業。加快中醫藥產業發展，著力打造中醫藥強省。」

不幸地，與日本、台灣、歐美等投資者不同，香港的企業在珠三角設立了超過 60,000 家的工廠，其中大部份屬於紡織服裝、食品飲料、建材等「傳統產業」，而且規模相對細小，佔地多而分散，因此在「改造提升」之列。

對於中國大陸經濟目前著重重工業和高新科技，香港能夠參與以及可得益的著力點實在不多，這是香港過往二十多年的結構轉型---非工業化所使然。至於出口導向的輕工業，香港看來仍將發揮一些作用，特別是把生產程序移出小珠三角之外。當然，最終要視乎中國的大型開放經濟策略、大進大出式的增長型態會有什麼的調整。

相反地，隨著高速發展，內地的金融實力與經濟實力却非常不對稱，服務業頗為落後，形成了顯著差距以至瓶頸。香港的金融及關連行業在這個領域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前景比較樂觀。

不過，其他被政府稱作支柱行業的物流業、旅遊業和商業服務等，由於外部競爭或者本身優勢下降的關係，前景就好壞參半。商業服務稍為看高一線，惟以專業服務為例，得益主要限於個別公司和機構，對香港整體經濟的回饋效應恐怕不大。

CEPA、9+2 等舉措令香港跟大陸經濟進一步融合。如同全球化一樣，增強

資源和產出流動是把雙刃劍，有好處也有壞處。它是一個高風險(希望亦是高回報)的發展道路。對任何經濟體系來說，開放「邊界」後，資源可以淨流入，也可以淨流出。競爭中的區域及城市必須提升本地優勢，才能保得住或者吸引更多的優質要素(Krugman, 1991)。

筆者曾經指出，面對區域性、城市間的激烈競逐，傳統的「市場對政府誰更重要」的二分化討論，已流於過時，往往變成意識型態的爭執，無大意義(曾澍基，2004)。

在新形勢之下，香港應該建立「政、商、學的三角聯盟」，共同協制經濟的路線圖(road map)，來明確發展策略與最優定位，集思廣益，把各種分散的私有資訊過濾為公共指南，為特區創新推動器。不同的界別、階層必須合作，既珍惜本地的歷史資產，也要了解國情---週遭環境巨大而迅速的變化。

問題在於，增加資源和產出的流動性相對地容易，它牽涉的主要屬政策決定。但是，發展與提升本地優勢，則麻煩困難得多。香港特區政府現時的策略，似乎是取易捨難。

(四) 資源流動效果的反例子：物流

香港自 1992 年攀上全球貨櫃港口的首席位置，1998 年一度為新加坡超前，但翌年即重登寶座。由於珠江三角洲進出口貨量急增，香港過去十多年的貨櫃處理量增加數以倍計。單單是港口核心活動，2002 年對 GDP 的貢獻便約 4%，提供了 11 萬個職位，屬香港外貿的重要支柱。

CEPA、9+2 之後，形勢似乎更應看好。不幸地，香港全球第一的貨櫃港口位置，2005 年竟被新加坡所取代，特區被貶為第二。

一些分析指出，2005 年的變化主要因素在於全球紡織品配額限制撤銷，令競爭加劇，珠三角愈來愈多的生產與行銷商，為了降低成本，把成衣改從鹽田及蛇口等地出口，不經香港。香港貨櫃箱的碼頭處理費較深圳港口高，惟後者的設施水準及航班密度，與香港已不遑多讓。加上陸路拖運費，特區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另一因素是國內城市作出大量基建投資而形成的競爭。深圳近年多組新泊位投入服務，而上海的進展就更厲害。2005 年，上海港口集裝箱的吞吐量急攀 24%，超過了 1,800 萬個標準貨櫃箱(TEUs)，深圳也跳升近 19%，到達 1,620 萬個 TEUs 的水平，分別佔世界的第三、四位置。

2006 年，趨勢持續(見表二)。世界貨櫃港口頭四位的差距迅速拉近。很多人士預測，不久香港和新加坡就會被上海甚至深圳超越。

表二 世界主要港口貨櫃吞吐量

港口/年份	標準貨櫃箱(百萬)	相對比率 (%)	相對比率 (%)
	2003		
新加坡	1841.05	100.00	
香港	2044.90	111.07	100.00
上海	1128.17	61.28	55.17
深圳	1061.45	57.65	51.91
	2004		
新加坡	2,132.91	100.00	
香港	2,198.40	103.07	100.00
上海	1,455.72	68.25	66.22
深圳	1,361.52	63.83	61.93
	2005		
新加坡	2,319.22	100.00	
香港	2,260.20	97.46	100.00
上海	1,808.40	77.97	80.01
深圳	1,619.70	69.84	71.66
	2006		
新加坡	2,479.24	100.00	
香港	2,353.90	94.94	100.00
上海	2,171.00	87.57	92.23
深圳	1,846.89	74.49	78.46

(五) 資源流動效果的正例子: 金融

金融服務方面，情況就不一樣。國內金融業的發展相對落後於經濟實質增長的需要，包括高效率的企業上市與融資機制；這些領域正屬香港的長處。「十一五規劃」也強調第三產業的重要性。

2005-06 年，國內的股市克服了之前幾年的困局，加上最主要的銀行金融機構的股份化改革以及相繼上市，再度熾熱起來。在香港掛牌的內地企業數目和股價都上升。到 2006 年底，中國內地企業佔香港股市整體市價總值已達到一半，成交金額為 60%(見表三)。

表三 中國內地企業（主板及創業板）

	2006 年底	2005 年底
H 股(隻)	141	120
紅籌股(隻)	90	89
非 H 股內地民營企業 (隻)	136	126
市價總值 (佔整體市價總值百份比)	50.3%	39.0%
成交金額 (佔整體股份成交金額百份比)	60.0%	45.9%

http://www.hkex.com.hk/data/markstat/markhighlight_c.htm

QDII、人民幣在港業務已經開展。於特區發行人民幣債券也放進了議事日程。除非國際經濟出現大波動(這一可能性不能排除)，香港金融業的前景，至少在未來五年是頗為樂觀的。其他相連的商業及專業服務亦有發展空間。

無論如何，若果只有金融服務一個行業蓬勃，將難以長期地向本地勞動人口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香港現時的挑戰是急劇的結構改變，需要政府採取有遠見的宏觀政策去應對，不能單單訴諸增加資源自由流動、「大市場，小政府」之類的普遍性原則和口號。

(六) 香港的內部憂患：人口質量

除了上述與經濟不對稱融合有關的矛盾外，特區還面對一些嚴重的內部憂患。香港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地方之一，2005 年女性平均生育率僅有 0.83 胎，遠低於保持人口絕對數量的約 2.1 胎。在這趨勢下，香港統計處預測：特區人口在 2003 年到 2033 年間，每年只會增長 0.7%(從 680 萬升至 838 萬)。這 158 萬的增量，是 174 萬的淨移入減去 16 萬人口自然負增長(死亡多於出生)的結果！

而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 2004 年有 81.88 萬，佔總人口的 11.9%。2013 年，老年人會升至 97.8 萬，佔總人口比例為 13.2%。2023 年的預測比率為 19.4%；到了 2033 年，香港每 4 個人中將有 1 個長者。

香港的總撫養比率(15 歲以下兒童和 65 歲以上長者的人口，相對於 15 歲至 65 歲人口的比率)，在 1991 年為 125：1000，2004 年升至 370：1000。統計處預測，比率於 2033 年會達到 598：1000。

不幸地，香港人口的平均教育水準卻很差勁。1991 年，15 歲及以上人口教育程度只有中學三年班或以下的佔了 57.1%。2001 年，經過 10 年的教育改革，比率仍然企於 47.8%；而 2006 年也不過降至 44.4%。這種情況與香港的所謂「知識型經濟」的發展路向，非常之不匹配。

香港的研究及發展(R&D)開支佔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亦偏低。跟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比較，特區的 0.44%(1998 年數字)至 0.69%(2003 年數字)的幅度，與它們同類估算的 2%左右的平均比率(2003 年數字為 2.24%)，相差很遠。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經濟發展一直都頗為機會主義，傾向「走短線，找快錢」；而部份本地企業已經冒升為世界級，財大氣粗，科技可以用金錢買回來，僱用外國專家處理，不必自己研究開發，使之在香港生根。

這些人口結構與素質的憂患，將會削弱香港經濟的長遠增長動力，並引致愈來愈沉重的福利負擔和嚴重的社會矛盾。

(七) 誰會為香港拼搏？

此類問題看來還未足以致命。然而，樂觀需要有基礎。一個先決條件是本地的政治體系必須克服精英發育不良和意識型態紛雜等障礙，與及從過往的歷史包袱釋放自己。沒有恰當的政策制定和實施機制，富遠見而又為多數人所接受的措施便難以推行(Tsang, 2003b；曾澍基，2004b)。

更且，香港屬誰？誰會為香港拼搏？那一些界別、組織及人士會把在特區開發具優勢的產業和服務、促進「龍頭行業」、以至保持香港作為區域性群聚中心，看成本身的首要任務？有承擔感的可能無甚資源力量；有足夠資源力量的則可能缺乏這種承擔。

資本和勞動力明顯地是兩個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上面分析了特區人口亦即勞動力的有限質量。相反地，就資本而言，香港却十分充沛，處於世界的前列。疑問不過是資本的擁有者對本地的歸屬感而已。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國際投資頭寸淨值」數據，香港的情況異常突出。國際投資頭寸淨值是指一個經濟體系由政府 and 私營部門在本地所擁有的直接投資、有價證券投資、金融衍生工具、其他投資及儲備資產的資產總值，減去同類負債總值的淨數值；而淨數值可能屬正數或負數。表四列出幾個淨值最大的經濟體系。日本長期是全球首席的資本輸出國；2005 年它的「國際投資頭寸淨值」達到 15317.6 億美元，超過香港的 4491.2 億美元三倍以上。不過，香港是個只有七百萬人口的小型經濟；相對於生產總值，香港的比率(252.7%)竟為日本 (33.6%) 的 750%!

表四 香港、新加坡與日本的國際投資頭寸淨值

(單位：百萬美元及百份比)

年份	香港		新加坡		日本	
	國際投資頭寸淨值 (Net IIP)	Net IIP/ GDP (%)	國際投資頭寸淨值 (Net IIP)	Net IIP/ GDP (%)	國際投資頭寸淨值 (Net IIP)	Net IIP/ GDP (%)
2000	221850	131.5			1157940	24.9
2001	265221	159.3	60888.00	71.1	1360090	33.3
2002	343337	209.7	81638.00	92.3	1462160	37.4
2003	394159	248.7	93900.00	101.3	1613620	38.1
2004	424752	256.1	102607.00	95.4	1784480	38.9
2005	449120	252.7	104507.00	89.5	1531760	33.6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其他反映香港企業世界級地位的國際報導也經常可見。例如，由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按上市總值編製出來的全球 1000 家大企業排名，2003 年香港便有 18 家公司列於名單之內---從最高位置的和記黃埔(第 140 位)到最低的利豐(第 979 位)，並包括了諸如恆生銀行(第 178 位)、長江實業(第 266 位)、新鴻基地產(第 328 位)、中華電力(第 382 位)、地鐵公司(第 646 位)和九龍倉(第 787 位)等集團(http://bwnt.businessweek.com/global_1000/2003/index.asp?country=HONG%20KONG)。

疑問在於：這些世界級的企業都正進行跨境或跨國經營。從某種角度來看，它們以及其他著名的國際集團就好像「大象」，而香港不過是個「荷花池」。沒有太多的理由去要求「荷花池裏的大象」(“elephants in the lily pond”)在一個小型開放經濟之中扮演長遠而重要的公共角色。如此要求對它們、對香港都不公平。說到底，關鍵是特區本身應該怎樣推行有效管治。

香港面對最深層次的矛盾可能是：有心者無力，有力者無心。

(八) 結構轉型還是結構解體？

如何解決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香港會否因中國大陸的崛起而被邊緣化呢？在不對稱的經濟融合過程裏，特區的命運到底是結構轉型還是結構解體？

作為對策，筆者近年的建議是兩條腿走路：香港須推展優化的二元經濟 (Tsang, 2003a；曾澍基，2003)。第一元由高增值、但低就業的精尖部門組成：驅動器為曼哈頓加具香港特色的小型創新中心(蓋涵金融、商業文教軟體、環保技術、中醫藥、生物及物料科學研製等行業)、和從傳統貿易投資衍生的跨境/跨國服務活動。第二元則為低增值、但高就業的勞動密集部門：包括旅遊、文化、娛樂、百貨、飲食、社會及個人服務、以至回收工業等。

第一元是經濟的火車頭，亦屬本地優勢的核心。第二元提供額外的動力，並作為連鎖效應的擴散器，替各階層創造較廣泛的僱傭機會。換言之，香港既要做亞洲的瑞士，也要做亞洲的西班牙。

另一重要考慮是人口質量。香港必須提升教育與科研水平，促進幾個龍頭行業，培養人才，形成足以吸引及匯聚世界上有關專家的中心點，這樣才可能在國際市場裏搶灘，鞏固上述的所謂第一元。歐洲的小型開放經濟如瑞士、丹麥、芬蘭、愛爾蘭的例子，值得香港借鑒。

香港經濟的經驗，是於東西夾縫之中生存、然後通過奮鬥終而達致高度繁榮的卓越例子。在極度缺乏資源的境況下，這近乎一個奇蹟。但再深入思考，它其實是好幾代人努力的成果，雖然成果的分配看來並不平均。

內地經濟迅速冒起所帶來的結構不平衡，乃香港最大的挑戰。歷史似乎轉了一個圈子。香港若變成「中國的另一城市」，便可能陷入長期相對下降的軌道。城市的興衰本來無甚特別，它或許只代表難以避免的區域性資源重新配置。不過，如果走向下坡是因社會內耗、定位不清或策略未能貫徹而導致，並連同把幾代人辛苦累積的有形及無形資產浪費掉，就比較可惜。更諷刺地，那種「命運」不會源於財富和權勢的欠缺。要慨嘆的，倒是肯為香港拼搏的優質人才難尋。

References

Krugman, Paul (1991), *Geography and Trade*,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and MIT Press.

Tsang Shu-ki (1994), “The Economy”, in Donald H. McMillen and Man Si-wai (eds.),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4*,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chapter 8, pp. 125-148.

Tsang Shu-ki (2003a), “Hong Kong’s Economic Strategy Reconsidered”, 7 April, article posted on author’s website: [www.hkbu.edu.hk/~sktsang/Devt_Strategy\(e\).pdf](http://www.hkbu.edu.hk/~sktsang/Devt_Strategy(e).pdf).

Tsang Shu-ki (2003b), “Hong Kong of China, Hong Kong of the World”, 15 September, Conference on *Hong Kong’s Past, Hong Kong’s Future: More Than An Economic City*, organised by Hong Kong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Civic Exchange and SynergyNet; article posted on author’s website: www.hkbu.edu.hk/~sktsang/HKoC_HKoW.pdf.

Tsang, Shu-ki (2004), “A note on spatial perspectives: Tacit knowledge, embeddedness and clusters”, 15 February, article posted on author’s website: www.hkbu.edu.hk/~sktsang/SpatialClusters.pdf.

曾澍基 (2003), 「香港經濟前路再考慮」, 載於筆者網頁 ([www.hkbu.edu.hk/~sktsang/Tsang_DevtStrategy\(n\).pdf](http://www.hkbu.edu.hk/~sktsang/Tsang_DevtStrategy(n).pdf))。

曾澍基 (2004a), 「特區的經濟發展策略與財政預算」, «信報月刊», 4 月號, 頁 4-6。

曾澍基 (2004b), 「由紛雜到多元? 香港政治的兩個推測」, 載於筆者網頁 (http://www.hkbu.edu.hk/~sktsang/From_heterogeneity_to_plurality_c.html)。